

關注組干預校務委員會沒有法律理據

楊耀忠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楊耀忠

公民黨最近推動「港大校友關注組」於9月1日召開港大畢業生議會特別大會，企圖製造壓力迫使校務委員會屈從畢業生議會的政治訴求，推陳文敏上位。眾所周知，香港大學是根據香港大學條例進行運作的，校務委員會的決定是最終的決定，「畢業生議會」並不是監察和制衡校務委員會的機構。關於副校長的任命，「關注組」並沒有法理依據去進行干預。公民黨為了壟斷和爭奪香港大學的人事權力，採取隱身術，用其他團體的名義干預大學自主權利，是賊喊捉賊，企圖欺騙、利用公眾成為他們謀取一黨之私的棋子。

公民黨背後發功 圖取港大人事權

「港大校友關注組」最近動議港大畢業生議會9月1日召開的特別會員大會，討論如何盡快完成香港大學副校長（學術及人事資源）任命程序，以及校監和校委會改革建議。支持的專業團體包括「法政匯思」、「杏林覺醒」及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等，這些團體都是激進的團體。他們動議的目的有兩個：其一，校委會30天內據既定的任命程序和行事習慣，盡快確認副校長物色委員會的建議；其二，改革管理制度，取消由行政長官兼任校監的安排，或只保留校監的禮儀角色。令人覺得奇怪的是，推動關注組組成的是公民黨，黨主席余若薇、黨魁梁家傑，骨幹成員吳靄儀捲入甚深。但是他們又刻意站在後面，企圖保持距離，轉了一個彎，抬出了「畢業生議會」的招牌，企圖干預校務委員會的決定和運作。

事件的主角是陳文敏，公民黨創黨的時候，曾經公佈創黨會員的名單，陳文敏身在其中。陳方安生組織的影響香港政制的團體「香港2020」，陳文敏又名列榜上。如果陳文敏能夠在公民黨向校委會施加政治壓力的支持下，成為管理香港大學人事和資源的副校長，香港大學裡面的公民黨黨員或者激進

的政治人物，就有機會雞犬升天，所以，公民黨全力為爭奪副校長這個職位衝鋒陷陣，組織暴力衝擊校務委員會會議和畢業生議會表決施壓力方式，務求令陳文敏當上副校長。但是，香港大學是一個公共的機構，絕對不應該由一個政黨控制其人事權。正因為如此，公民黨才變玩花樣，採取了隱身術，用其他團體的名義進行干預。

「關注組」沒有法理依據干預遴選

這次糾紛的起源，是校務委員會並沒有通過陳文敏擔任副校長的決定，而是採取擱置討論這個議題的安排，直到首席副校長委任出來為止。校務委員會主席梁智鴻已經通過電郵的方式，向各有關方面解釋說8月份就會決定首席副校長的人選。既然如此，這就是讓主管人事和資源的首席副校長參加副校長人選（因為負責人事的副校長是他的助手）的決定，聽取首席副校長的意見，在時間上，配合緊湊，並不是遙遙無期拖延。眾所周知，香港大學是根據香港大學條例進行運作的，校務委員會的決定是最終的決定，「畢業生議會」並不是監察和制衡校務委員會的機構。公民黨突然抬出「畢業生議會」的招牌，干預校務委員會的決定，沒有法理依據，也是公民黨為謀取一黨之私利，企圖洗脫嫌疑

的一種不光明正大的做法。

政黨要壟斷和爭奪香港大學的人事權力，是不妥當的。但是公民黨倒過來說，校務委員會擱置陳文敏的副校長任命，是政治干預了大學的運作，是梁振英干預了大學的自主權。如果這是真實的，他們就應該拿出證據，等委任了副校長之後，甚至提出司法覆核，不要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扭曲事實的真相，欺騙公眾，企圖蒙混過關。

港大不可能照搬英學府管理做法

公民黨和關注組，一直強調香港大學不應該繼續由行政長官擔任校監，應該學習英國的牛津和劍橋，因為這兩所大學，都不是英國首相擔任校長。英國的牛津和劍橋的成立歷史，和香港大學成立的歷史是不同的，關注組引用英國的例子，非常不恰當。香港大學的成立，由英廷授權及當時的港督盧吉協助籌辦的。香港大學個別院系課程設計、教師聘任、舍堂生活甚至不少建築物也處處突出了英國高等學院文化的獨特風格，在籌辦的過程，港督盧吉深深地介入了香港大學的管理，並且控制了課程設計、教師聘任和以後的校務委員會的角色。這個角色一直維持到1997年。陳方安生說，港督有權而不用。港督影響大學校務委員會的人事任命，這都是公開的事實。至於怎樣通過內定的渠道，讓港督的想法被校務委員會知道，也不需要對外公開宣佈，外間對此不知道，不等於港督不能影響大學的管理。根據現在的香港大學條例，某一些內部的文件，仍然呈交香港大學校監簽署。這正是香港大學在特定的條件下延續下來的運作。

英國牛津及劍橋大學的成立和香港大學完全不同。這兩所大學已經有800多年的歷史，英國皇室及基督教會與這兩所大學密切關係。1225年劍橋校監

的出現，代表校監及院士希望在劍橋區外的ELY小鎮教會區內，以一個獨特基督教會組織形式管理及運作大學。直到1231年，由英國當時的國王亨利三世決定成立大學。國王亨利三世將校監(chancellor)與院長(masters)組成一個公司模式，成為大學之基本管理架構。重要的是，英國牛津、劍橋大學都得到國王、教宗及教皇的共同認可，從而確立國家大學之地位。沒有這段歷史，牛津劍橋也就不可能集中國家的資源，辦得那麼成績輝煌。在這個背景下，英國首相當然不可能成為牛津和劍橋的校監。香港大學的歷史軌跡不同，回歸之後，關注組提出照抄英國牛津和劍橋的管理方法，並不實際。劍橋大學由幾十間學院所組成，各自有不同的歷史，院長產生的方法，各有不同，到現在，有一些學院的院長，仍然由英女王委任。如果要照搬英國的模式，是否港大一些學院也要由行政長官或者中央人民政府委任？所以，香港大學照抄牛津和劍橋，並不是香港應該追隨的方向。

英國劍橋大學上一任校監是愛丁堡公爵，當校監長達35年，後來退任大學校監一職，打破皇室傳統，改為Lord Sainsbury由選舉產生。但英國劍橋大學條例，需要高級的教授和有院士水平的學術精英，才有資格選舉校監，學術水平不足夠的本科畢業生之校友不能投票選出大學校監，不能干涉大學的行政管理。現在港大關注組卻要求由他們來修改校監產生的方法，並且製造形勢迫使校務委員會屈從畢業生議會的政治訴求，即是說，他們根本就不贊成英國的精英管治模式。他們要創造一個拋棄香港大學條例的政黨介入模式。這就是一種革命，歷史可以不要，法制也可以不要，這對於香港大學來說，當然是最糟糕的結果。

民企參與「一帶一路」之機遇

莊聰生 中國民間商會副會長



「一帶一路」貫穿歐亞大陸，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濟互補強，彼此合作潛力和空間很大。

內地民營企業已經成為實施走出去和「一帶一路」戰略的重要力量，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解決結構失衡、效益低下等瓶頸問題，有助於企業轉型升級，獲得新的發展機遇。

從「一帶一路」獲取發展動力

目前民營企業普遍面臨產品市場飽和、資源短缺、勞動力成本上升、高端技術支撐不足等問題，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解決結構失衡、效益低下等瓶頸問題，有助於企業轉型升級，獲得新的發展機遇。

全國工商聯今年上半年在全國開展大規模調研顯示，近年民營企業「一帶一路」投資發展主要有五種模式。一是在境外建立工業園區，抱团走出去。比如浙江的華力集團、江蘇的紅豆集團等都建設了一大批集保稅區、物流倉儲區和商業生活區為一體的工業園區，吸引國內的企業入園。二是獲取境外礦產等能源，延伸產業鏈。新疆廣匯集團利用地緣優勢在中亞一些國家投資油氣項目，建設輸氣管道，將開採的天然氣和石油輸送到國內使用。三是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獲取一些比較先進的技術、優質品牌和營銷網絡等要素，增強國際競爭力。四是在境外投資設廠，實現產業轉移和產能合作。比如福建的福耀玻璃集團、河北的長城汽車等，都在境外國家投資建廠，大大節省投資成本。五是承接對外工程和勞務合作，建立商貿城，帶動產品、技術走出去，帶動中小企業走出去。

加大政策扶持 鼓勵企業「走出去」

當前民營企業參與「一帶一路」的積極性越來越高，投資的

規模也不斷增大，但總體上看，大多數是自發的、零散的、單打獨鬥的走出去比較突出，總體水平還不夠高，也面臨着不少的困難和問題。一方面，政策體系還不完備，企業普遍反映對外投資的同一個項目仍需向兩個部門備案和申請核准；還存在一些政策障礙，比如一些企業收購的國外金融保險企業，因政策障礙致使獲取的成本資金不能回國投資；一些政策的操作性也不強，例如中國與一些國家簽署了雙邊稅收協議，但企業在部分國家難以獲得繳稅憑證，地方稅務部門不能甄別，致使有些企業難以享受到稅收抵免；另外，一些在境外獲得的資源，受配額的限制，如棉花、蔗糖等，不能運回國內。另一方面，企業普遍反映目前的金融服務比較欠缺。企業在「一帶一路」投資的資金來源中，主要依靠大部分都是自有的資金。融資難、融資貴、融資渠道少，成為制約民營企業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一個瓶頸。

由此，推動民營企業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可以在創新政策支撐、體制機制和服務保障上多做一些文章。加強財政支持，鼓勵民營企業建立境外工業園，獲取稀缺資源。民營企業建立境外工業園區有利於中小企業抱团走出去，防範和規避風險，有利於帶動國內裝備和產能走出去，有利於投資的深度融合，解決就業改善民生，贏得民心。

強化金融保險、外匯對民營企業走出去的支持。加快國內金融機構走出去的步伐，特別是做好「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金融服務布局，擴大覆蓋面，提高服務能力。進一步發揮政策性、保險機構的作用，採取降低費率、擴大覆蓋面、創新保險產品、提升理賠效益等措施。加大對企業境外投資，特別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的保險支持力度。

提高商務外事服務民營企業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能力。駐外使領館應當建立健全民營企業的溝通機制，經常參加一些座談會，聽取他們的意見建議，對民營企業發出的一些函件，應當及時的給予幫助解決。同時，進一步支持中介機構走出去，發揮工商聯等商協會的作用，讓民營企業更好的在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當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莊聰生

政府應提高個人及獨居免稅額

李家家 愛護香港力量行動召集人

香港在2007年開始至2014年，社會生產總值累積有26.99%的升幅，但同期只計算生活必需的甲類物價指數卻累積升27.51%，經濟增長跑輸通脹，小市民的生活壓力可想而知，生活質素下降，民眾的怨氣自然增多。

雖然香港實行低稅政策，但對納稅人影響最深的個人免稅額卻由2006年的10萬元有限地調高至2015年的12萬元，累計升幅只得20%，除了不能和生產總值同步外，更遠遠落後於甲類消費物價指數。由2006年至2015年的甲類消費物價指數累計升幅達35.28%，比免稅額升幅多15.28%。因此財政司在制定來年財政預算時，應計算由2006年至2016年4月，甲類消費物價指數的升幅，提高個人免稅額至和甲類消費物價指數同步，保障基層市民生活水平。

香港社會計算個人生活支出所需，一向有一套被社會大眾所接受的客觀標準，以申請公屋的息上限為例，一人的息上限是月入10,100元，兩人是月入16,140元。申請綜援的資產上限，一人是28,000元，兩人是43,500元。這充分說明，兩人或以上同住能大幅降低生活支出所需。但香港入息稅卻完全忽視這個要素，不論你是家庭中的一分子或是一位獨立居住人士，都是劃一計算個人免稅額，這樣未免有失公允，政府需要重新檢討有關制度。

政府除重新檢討免稅額制度，提高個人免稅額至能抵消甲類消費

物價指數升幅外，還需適當增加個人獨居免稅額，基本要達到個人免稅額的40%。2014年度，香港政府的薪俸稅收入有556億元，佔全年稅收2,435億元不足四分之一，共有182萬人需繳交薪俸稅，其中5%的納稅人（約9萬人，平均每人繳納37萬元的稅款），共繳納了六成的薪俸稅，他們全部是繳交15%標準稅率的超級「打工仔」，免稅額多少對他們完全沒影響。其餘只繳納222億元薪俸稅的173萬納稅人，有42.4萬人每年只交付平均1,000元的薪俸稅。如果將個人免稅額提高，並保持不低於甲類消費物價指數增幅，對香港政府稅收影響將會十分輕微。相比較每年退稅或寬減75%薪俸稅，此舉更能幫助草根及中產階層紓困，減輕他們的壓力。

本年度寬減75%薪俸稅上限2萬元的措施，對中低收入人士幫助不大。年收入達到90萬或以上的上層精英（約16萬多人），每人能取回2萬元寬減上限。對年收入90萬元的人群來說，這些退稅對他們而言只是錦上添花。年收入50萬元的中產階層（約33萬多人），只能平均每人取回15,000元寬減，對年收入平均50萬元的中產人士，15,000元退稅，絕對稱不上雪中送炭。人數多達424萬元，每年收入不超過20萬元的草根階層，每人只有平均700元寬減，可謂是杯水車薪，毫無幫助。提高個人免稅額及增加獨居免稅額，將更有效及更公平地幫助基層及中產階層改善生活質素。

樹熊之外還有葡萄酒——香港南澳結緣

蘇錦樑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8月中到訪澳洲，其中一站是南澳。世界葡萄酒指南葡萄酒地圖(World Atlas of Wine)把南澳譽為澳洲葡萄酒之省，因為它既有著名的大眾化品牌，又有全澳洲「Langtons」葡萄酒分級制中21個最高級品牌的其中13種。

香港和南澳已建立了多年的葡萄酒貿易關係，其中Barossa Valley、Coonawarra、Eden Valley及McLaren Vale等地的出品一向為人熟悉。根據澳洲的統計數字，2013至2014年香港為南澳第六大葡萄酒出口地，按當時匯率計總值超過港幣4.5億元，佔全澳洲出口到香港的葡萄酒總值近四分之一。所以今次南澳之行其中一個主要目的是在當地進一步開拓香港葡萄酒貿易的商機。在南澳站和我同行的葡萄酒貿易業界代表包括扎根香港的葡萄酒大師Debra Meiburg、香港葡萄酒商會會長何耀康、香港葡萄酒業協會會長李滿華及香港品質保證局助理總監彭文俊。

有見香港的重要地位，南澳高規格招待我們，除了獲安排在國家葡萄酒中心、澳洲聯邦葡萄酒局及南澳葡萄酒會與高層人員會面交流兩地葡萄酒業最新發展，亦和當地著名酒商共晉午餐，探討商機；更獲南澳州總督在官邸設晚宴招待，席間交流如何加強兩地聯繫。此外，我亦參觀了澳洲葡萄酒Wine Innovation Cluster，了解大學和相關產業如何合作，推動葡萄酒和其他產品的科研和商品化。除了我努力在當地推廣香港葡萄酒商機外，同行的葡萄酒業界代表亦趁機在不同場合和南澳葡萄酒及相關行業人士探討合作項目，也接受了著名葡萄酒雜誌《Wine Showcase》亞太版的主編訪問，介紹香港葡萄酒業的優勢。

內地是澳洲主要的葡萄酒出口地。澳洲多年來穩佔中國內地葡萄酒市場第二位，去年澳洲出口內地葡萄酒總值達港幣20億元。2015年，中國和澳洲政府簽署了自由貿易協定，在協定下，內地分四年將澳洲入口葡萄酒等徵收的關稅，由14-20%降至0%。中澳自貿協定生效後，相信內地對澳洲葡萄酒需求會更殷切，香港的門戶角色亦會更加吃重。

我這次南澳的訪問，正好在中國澳洲自貿協定生效前進行。此行讓我們有機會盡早協助香港業界爭取商機，向南澳各界介紹香港為何是全球各地葡萄酒，特別是南澳出品，進軍中國內地的理想門戶。未來特區政府會繼續全力支持業界作好準備，迎接商機。



■蘇錦樑

目前，全世界正面對一場股災，這場股災是從中國開始的，換言之，今日的中國經濟力量已經龐大到足以影響全世界。

開始的時候，是中國政府眼看股市太過狂熱，而且民間借錢炒股的借貸比率太高，因此出手查處被稱為場外配資的行為。所謂場外配資就是高槓桿高利率的借貸炒股，政府一查處，股市就由高峰處直跌而下，在很短的時間內，滬綜指下跌三成以上，投機者開始大手沽空股指期货。於是，政府又出手打壓查處惡意沽空行為，股市又漲了，快速地回升，場外配資再出現，於是再次查處，股市再跌，一跌，又再出手救市，政府動用現金買股票。不過，經過數次的升升跌跌之後，不少股民失去信心了，終於最近一次滬綜指跌至上幾回政府出手救市的3,500點時，政府沒有再出手救市，於是股市一瀉如注，滬綜指跌破3,000點。

與此同時，美國股市也出現崩盤式的下跌。過去8個月，美國股市於高位浮沉波幅不大，道瓊斯指數於17,300至18,300之間徘徊，最近的一次，終於跌破17,300而沒有反彈，更直瀉至16,000之下。美股的下跌，原因相當複雜，中國股市大跌，人民幣貶值都是導致美股下跌的原因，再加上美國投資者本身也很擔心美國聯邦儲備局會不會在9月份加息，股市的暴跌是投資者對加息的預期。

為什麼中國政府不再直接出手救市？相信最大的可能性是中國政府希望減少干預，讓股市自己尋找支持點，讓市場來決定股價的高低。不過，與此同時，中國政府決定不斷地改善營商環境，繼續減息降準。實際上，中國股市之所以能從去年11月開始上升，主要的影響力就是中國政府不斷地改善營商環境，除了不斷地減息降準外，也增加基建的預算，提出「一帶一路」戰略規劃。

中國A股股災，美國股災，香港及世界各地都不可避免地一起出現股災。

股災會不會導致經濟環境變差才是我們更應該關心的事，這也是為什麼中國政府在滬綜指跌破3,000點後宣佈減息降準。港元與美元掛鉤，如果美元加息，港元不可避免地也得加息，那肯定會對已經問題重重的香港經濟再踩多一腳，這是香港政府、市民都必須面對的。面對不明朗的將來，香港人還有多少本錢可以繼續內鬥？

曾淵滄博士